

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

华北教育的 近代化进程

王兆祥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多視野的中華民國史研究叢書

华北教育的 近代化进程

王兆祥 著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王兆祥著 .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688-400-3

I. 华… II. 王… III. 城市教育-教育史-华北地区-近代 IV.G5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1819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www.tssap.com
印刷：天津雍阳印刷厂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2004年12月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正式启动，“中华民国史”被确定为市首批重点学科给予扶持和资助，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张利民研究员被聘为该学科首席专家。这是天津市委市政府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有力支持和激励，有着重要意义并产生深远影响。

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地位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任务，面对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更加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努力为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天津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天津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应当努力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

学科建设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华民国史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学科，在改革开放以后得到迅速发展，且不断充实、拓展。在一般意义上讲，这一学科属于传统学科，应当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点面结合、重点建设的原则，对“中华民国史”研究学科进行适当调整，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巩固，使之增强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同时，要重视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的交叉渗透，以增强创新能力。创新是科研的生命。学科创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把握学科建设规律，积极推动学科体系创新、

学术观点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

中华民国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具有时间上距离当今时代最近的特点，研究前朝的兴衰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有着较为直接的借鉴和参考，同时也需要新的研究思路。由张利民为首席专家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组，确定将研究成果汇集为“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说明该课题组具有创新的意识，并将这种意识运用到科学的研究中。21世纪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框架，勾画中华民国发展的总体脉络，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作用，整理出版档案资料。但仅此还是不够的，对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应该有新的起点和新的思路。要从20世纪后进入全球化的新视角，积极探索中国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要重视中国几千年来在思想、制度、伦理、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浸透和惯性，构筑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框架体系；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重需要，从更多领域和视角来研究多层次的发展变化，不放弃从细节与偶然性中探求规律性；要注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区域之间的比较、城乡之间的差异，从差异中发现新的问题；要提倡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介入，进行多向思维与解读；要鼓励新资料的挖掘整理、数据的量化分析，以致于视图传媒、田野考察、口述史等方法获得的鲜活素材，体现历史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总之，要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

这套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课题组的部分成果，同时也是搭建起一个平台，希望研究者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一广阔的空间，锻造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天津社会科学院院长 李锦坤

(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3月

序 言

“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首批项目——“中华民国史”的成果汇集，重点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区域、城市、乡村等多视角论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变迁。

该丛书所追求的多视野，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方法，更重要的是顺应当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趋势，多角度地开拓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制定过中华民国史研究规划，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华民国史研究迅速兴起，现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无论是系统的通论和专题研究，还是对事件、人物的评介和档案资料的积累，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为中华民国史研究打开局面，奠定了基础，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研究力量，也成为一些科研院所的优长学科。今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一方面要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如对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在外交、经济和稳定社会等方面的作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互动、农村基层社会与经济的演变、城市的管理和社会控制、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以及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等。另一方面，还要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层面，如制度创新、机构重组、法制建设、生态环境演变、空间布局态势、城乡社会经济制约、城乡文化生活差异，以及技术改革与社会进步、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控制力与制约因素、时尚与风俗等，从多学科的角度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区域特点与比较研究。通过新领域和新视角的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梳理中华民国发展的总体脉络，总结发展规律和特征，还可以充分论述各个层面的演变，分析历史发展中的细节和偶然因素，进而更全面系统地阐释中华民国的兴衰，更生动具体地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轨迹，更客观准确地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多领域多角度研究中华民国史是我们的一种尝试。中国自开埠通商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领域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不能仅仅归结为西方入侵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本身长期形成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机制，要充分考虑到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价值取向，也要

2 津海关贸易年报（1865~1946年）

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空间环境、不同领域在发展模式、方法和程度等方面差异和特点。因此，我们将从制度、网络、环境、法律、风尚等领域，论述开埠通商以来，特别是20世纪进入全球化大环境后中国在城市与乡村、社团与慈善、教育与文化、生活与娱乐等方面的演变；既有全国的宏观研究，也有一个区域和城市的微观探索；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并注重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华北区域，其目的为多角度剖析中国不同领域和侧面的发展历程，探求不同区域发展的特点和范式。

我们相信，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将为民国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和视角。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在华北区域史、城市史、商会与商人、租界与城市社会、义和团与近代社会、民国北京政府与人物等方面的研究有着良好的传统和优势，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撰写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专著和论文；近代城市史、华北区域史和商会史等方面的研究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赞赏和关注，并连续十七年编辑出版全国惟一的城市史研究连续出版物——《城市史研究》。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完备，有着较为优越的发展潜质。参与中华民国史研究项目的有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员，有年富力强的青年科研骨干，博士占半数，是一个稳固的且具有很强凝聚力和相当学术水平的研究集体，在国内外相关的研究领域中形成自身的特色和影响。“中华民国史”课题组研究的成果将以“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的形式陆续面世。该丛书按照“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总体规划，对于近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开展专题研究，其成果除了课题组内多次讨论审议外，还经过了专家评审；有些成果是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充实和提升。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前瞻性。

当然，作为新的尝试，我们的成果会有诸多不足，我们期望学术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多视野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主编

张利民

2006年2月

目 录

导言	(1)
一、华北教育研究的意义	(1)
二、教育现代化研究现状	(3)
三、华北教育的历史分期	(7)
四、华北教育研究的特点	(9)
第一章 华北社会状况与文化转型特征	(11)
第一节 封建社会末期华北的社会状况	(11)
一、城市网络和文化格局的形成	(11)
二、区域教育文化的转型与认同	(15)
第二节 华北教育文化的选择和论争	(21)
一、传统科举制度的没落和衰竭	(21)
二、西学东渐与中西教育观之争	(25)
第二章 西方文化对华北教育的冲击	(29)
第一节 传教士敲开华北教育门户	(29)
一、传教士带来西方教育文化	(29)
二、教会学校对传统教育冲击	(33)
第二节 洋务运动与学堂教育的开展	(37)
一、洋务人才需求和洋务学堂的创办	(37)
二、书院的普遍整顿和改学堂的过程	(42)
第三章 华北近代教育萌芽的出现	(47)
第一节 维新教育思想启蒙和《癸卯学制》的推行	(47)
一、华北近代教育的思想启蒙	(47)
二、清末新学制在华北的推行	(50)
第二节 近代教育模式的传入和实践	(55)
一、新式大学教育在华北实践	(55)
二、现代教育管理制度的出现	(63)

2 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第四章 实业教育的普遍认同和发展	(68)
第一节 华北农、工、商实业教育	(68)
一、山东直隶工农业实业教育	(68)
二、天津的商业实业学堂教育	(72)
第二节 周学熙、袁世凯的实业教育实践	(76)
一、周学熙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76)
二、袁世凯的实业教育思想与实践	(80)
第五章 军事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教育特色	(85)
第一节 军事集团的军事教育及其影响	(85)
一、李鸿章军事集团的军事教育	(85)
二、袁世凯军事教育和影响启示	(90)
第二节 普遍开展的华北职业教育与女子教育	(94)
一、华北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	(94)
二、华北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	(100)
第六章 教会学校教育与勤工留学教育	(108)
第一节 华北教会学校的初步发展	(108)
一、传教士与早期教会小学的出现	(108)
二、天津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教育	(112)
三、狄考文与山东教会学校的开展	(119)
第二节 教会学校与高等教育及师资培养	(120)
一、教会学校与华北高等教育	(120)
二、教会学校与近代师资队伍	(124)
第三节 走出国门的留学教育与勤工俭学教育	(130)
一、华北留学教育起步与形成规模	(130)
二、勤工俭学教育与工学结合教育	(135)
第七章 辛亥革命与华北普通教育的发展	(143)
第一节 辛亥革命与华北教育的调整	(143)
一、清末同盟会在山东创建的学校	(143)
二、民初学制颁布及中小学的调整	(147)
第二节 华北高等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形成	(148)
一、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	(148)
二、华北师范教育发展和定型	(152)
第八章 华北社会教育与社会组织	(156)
第一节 五四时期教育改革的蓬勃开展	(156)
一、开民智与民主科学教育思潮	(156)

目 录 3

二、北大改制与民国新学制出台	(160)
三、各地开展和普及的义务教育	(164)
第二节 华北社会教育与华北社会组织	(169)
一、社会教育与城市文化的兴起	(169)
二、社会教育机构和团体的涌现	(173)
三、华北社会教育开展及其影响	(179)
第九章 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的社会影响	(185)
第一节 “平民教育”思想出现和推广	(185)
一、平民教育思想和平教活动的开展	(185)
二、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主要内容	(188)
第二节 “乡村教育理论”及其教育实践	(191)
一、华北乡村新式教育的开展	(191)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内容	(195)
第十章 华北沦陷和战后教育的曲折发展	(200)
第一节、华北沦陷和教育的摧残	(200)
一、传统教育秩序破坏和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200)
二、华北民众的抗争与敌后抗日教育的发展	(206)
第二节 坚持后方教育和战后教育的恢复	(209)
一、华北各地学校南迁和战后学校的恢复	(209)
二、一二·九运动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	(214)
第十一章 根据地和解放区干部、群众教育	(219)
第一节 根据地教育的独特形式和内容	(219)
一、根据地教育的方针政策	(219)
二、根据地教育的组织管理	(223)
第二节 根据地、解放区教育的发展和巩固	(228)
一、培养干部宣传群众的教育创举	(228)
二、华北解放区民主教育新的发展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55)

导言

一、华北教育研究的意义

“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教兴国”已确立为当今国策。印度一位前领导人曾说过，“未来世界的竞争在教育”。所以中华民族在未来欲生生不息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始终扎实实地抓好教育，不断推动教育现代化。而“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对教育发展历程作纵向史的研究，探求其规律，观察其得失，以指导今天，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关于华北教育的书，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它更多反映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北方区域的教育特色。近代华北教育，实际上就是华北地区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演进过程。应该看到，华北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和全国教育一样，是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在机遇、挑战面前，实现了教育的转型。就区域教育的发展来说，华北教育具有许多可以汲取的经验。因此，华北教育现代化不仅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值得关注。

2004年天津市制定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由市政府直接牵头确立天津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民国史研究”。重点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区域、城市、乡村等多视角论述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本书作为课题之一，以华北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几个省份）为范围，全面揭示其教育发展的历史面貌。

书中以专题作为设置纲目的一条主线，同时兼顾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力图将华北的教育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大的框架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考察。客观地总结中国北方教育发展的历史特点，使读者对近代中国北方教育有一个全面、理性、客观的了解。就是说，不仅描述华北区域内各地的教育状况，并且尽可能地指出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在全国所

2 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处的教育地位。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转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之所以取名：“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也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本意。

北京自金代定都后的 800 年间，一直是全国教育的中心。尤其是明清至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数百年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变，肩负“立国”使命的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作为封建教育和近代教育体制拟定、管理和政策实施的中心，一直到 1927 年（民国十六年），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及其周围位列畿辅重地的天津、河北和鲁、豫、晋三省，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上，“华北”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概念。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随着在华洋人对中国地理的深入勘查，19 世纪末南方和北方的空间概念渐次形成，这时的“North China”泛指中国北部、北方诸省。《华北月报》的英文名即为 *NORTH CHINA CHURCH TIMES*，之所以使用“华北”一词，大概是因为创办者中文名称为华北善会之故，该月刊主要介绍北京、天津、直隶、山东和辽宁等地的传教活动。^① 从行政区划看，华北包括京津和冀、鲁、晋三省，河南省黄河流域的一部分，以及内蒙古的中西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交通变革、商品经济发展和城市吸附力的增强，各经济区域的临界线愈来愈不清晰，边缘地区相互重合，相互渗透，许多地区都有着“双重身份”。

就教育来说，历史上并没有单独以“华北”的名义发布各种教育政令，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华北区域教育的研究。这里所以冠以“华北区域教育”，确切地说是指京、津、冀、鲁、晋几个省区反映出来的“北方教育”。就是试图把教育从一个地方或几个地方扩大为一个整体的区域，换一个视角进行研究，或许能得出一个新的研究结论，这就是本书写作的初衷和目的。它的研究既区别于地方教育史研究也区别于全国的教育史研究，这种尝试应该是有意义的。

在华北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离不开一批致力于教育改革的教育家，因为他们是新型教育科学的人格化代表。从教育实践角度看，教育家不仅是教育思潮的倡导者，也是教育科学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更是近代教育活动的直接实践者。在早期教育现代化运动中，华北涌现出一批旧派但却对中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其中以李鸿章、盛宣怀、严修、张百熙、袁世凯、蔡元培、张伯苓、晏阳初、梁漱溟、刘宝泉等人为代表，他们或负有制定中央教育政策之大权，或在教育理论上提出独到见解，或以自己的切实努力推动地方教育改革。他们的努力为华北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华

^① 张利民：《论华北区域的空间界定与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6 年第 5 期。

北教育谱写了有声有色的篇章。

从整体上看,辛亥革命以前的华北近代教育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学的传播而逐渐由传统实现向现代的转变,并且通过他们开始着手华北近代新教育的建立。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只是转型期的传统教育家,具有“旧大于新”的特点。他们从传统中分离出来,还带有浓烈的旧色彩;他们主张学西方,但仍以“中体西用”规范之;他们希望改革旧教育、改革旧制度,但不敢非议君权。这些处于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特征即是当时中西文化碰撞的反映,又是转型期中国近代社会特征所决定的。^① 教育转型,说到底是从事教育的人的转型,正是这些身处华北的教育精英们,在华北教育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扮演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角色。

华北区域教育主要是指华北的城市教育。如山东济南、山西太原的教会教育、河北保定的军事教育、天津的实业教育、北京的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等等,华北教育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创立一个区域教育研究空间,为区域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领域。积累一定的学术研究资料,为华北区域城市史的研究打下一个基础。

二、教育现代化研究现状

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对传统的文教模式产生了“认同危机”,但他们既看到域外文化的先进,又无法摆脱对自我文化的依恋,这种认识的矛盾,使他们采取了“中体西用”的思维观念。当时在“坚船利炮”的强力冲击下,他们先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教育制度的主张,即表现为“采以西方技艺,辅以中国文物制度”的操作模式。19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是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碰撞。“中体西用”是这种碰撞中弱方的一种过渡式的求全之策。对于贤达的革新人士来说既是向西方学习强国之术,又可保护自己不致有“以夷变夏”之嫌的护身符;而对守旧顽固派势力来说是既可以抱残守缺,又不至于亡国灭种的救命稻草。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从“师夷”、“制夷”、“长技”、“西用”等迫于外强的防卫性的教育转化,但在一定意义上它已成为中国人对教育现代化的一种自觉欲求。尤其是表现在李鸿章等人在华北创办的一系列洋务教育上,这种性格更为鲜明。

洋务教育家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式学堂,其中就包括在华北开办的京师同文馆、天津北洋大学、山东大学、山西大学。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尤其是在培养军事留学人才的同时培养出第一批科技人才,开始了中国儒学教育向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教育转化。教育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更容易承认西方文化,他们提出的教育思想不仅包括西方的科学技艺,还包括西方内

^① 李涛:《论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以晚清民国教育家群体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 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政、外交,即政治制度的层面。这一时期,外国传教士的足迹进入华北沿海诸如天津、烟台、青岛等城市,继而进入北京和太原等内地,加入开办教会学校教育的行列。他们首先在沿海口岸的市民知识分子中打开教育的缺口,引领风气之先。因此,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新式教育的影响始终限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和内地教育的面貌仍然是比较传统的。近代教育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问题,就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活跃于近代中国教育和思想界,被认为是保守派的梁漱溟等人也主张变革旧传统,只不过他们觉得这种改变应是应中国的现状和中国文化的形态。^①

早在 20 世纪初叶,中国就已经开始对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三四十年代曾有过相当的建树,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直琢“文革”。中国教育发展更上一层楼,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教育现代化问题远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再次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倡导实施教育现代化。在 1993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文件中曾这样写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 20 世纪末,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市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政府的倡导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针对教育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教育现代化的概念、教育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以及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原则、途径和方法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从教育现代化的分期来看,可以分为初级教育现代化和高级教育现代化两个阶段:初级的教育现代化是以工具理性为最高原则,根据经济、科技和政治等不断变革所提出的要求,全方位变革不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使之向以功利性和效率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高级的教育现代化是以全面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最高原则,根据人的全面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持续进步的要求,全方位变革不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使之向合理性与效率性相统一的现代教育转变。近代的华北教育正是经历了由初级教育现代化到高级教育现代化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这种变革包括教育的多个方面和多个领域,如华北广泛开展的教会学校教育,其中以天津和山东的沿海城市最具特色;再如华北的实业(包括职业教育),就有山东、河北的农

^① 杨东平:《百年回首——中国教育现代化之梦》,《中国论坛》2003 年第 4 期。

业教育、天津的商业教育、北京的语言职业教育、山西的义务教育等等；尤其是晏阳初、梁漱溟在河北、山东分别倡办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更是全国学习和效仿的模式。还如华北的军事教育，包括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军事集团教育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陆军军事集团教育，他们的教育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走向，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与他们这种教育的私人化、教育的集团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他还有华北的留学教育和勤工俭学教育在当时成为全国最关注的地方，一批有志青年从这里走出国门，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和华北解放区的干部、群众教育，为全国做出榜样。华北联合大学的教育实践为全国解放后新中国教育的迅速建立积累了经验。所有这些教育活动，无一不是华北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的历史痕迹。

教育作为一种现实，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变化发展是与社会的变迁相一致的。因此，认识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首先要从现代化概念的含义和现代化过程的特征入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谐社会的今天，教育现代化这一话题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据初步统计，近几年来，仅国内冠以“教育现代化”字样的论文就达数百篇之多；公开出版的著作已有十多部，包括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丛书、田慧生主编的《中国教育的现代化》、陈龙飞著的《科学技术与教育现代化》、顾明远主编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王铁军的《教育现代化论纲》、冯增俊、朱仲南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教育现代化研究》丛书、邬志辉的《中国教育现代化新视野》、成有信主编的《现代教育引论·现代教育·现代社会·现代人》、厉以贤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黄济、王策三主编的《现代教育论》、顾明远、薛理银的《教育与国家发展》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教育现代化概念通常在两个维度上使用。在时间维度上，教育现代化体现着古代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对比和过渡；在文化维度上，则体现着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划界和渗透。客观地说，教育现代化确有过程和目标两种意义。为了对此明确区分，可把过程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称之为“教育的现代化”，概指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不断改革与发展过程；而把目标意义上的教育现代化称之为“现代化的教育”，泛指教育自身改革和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或教育现代化实践所获得的结果。虽然现代化的教育作为目标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有特殊的质的规定，但从过程意义上说，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又是一个动态的谱系。

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在教育现代化方面的认识并不一致。大致可归

6 华北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为以下四大类：第一类认为，教育现代化是超越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的整体转换过程，其核心是促进人的现代化。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最多。^① 第二类认为，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教育的现代性不断实现与增长的历史过程，即科学化和福利化的不断实现与增长。概言之，“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教育获得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当教育通过变革而具备了工业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时，就表明它获得了现代性；当教育改革使它具备了信息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时，就表明它完成了现代性的深化”^②。第三类认为，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过程的实质是教育适应和促进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教育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以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客观需要为动力，以社会文化的全部最新成就武装教育各个层面，使教育自身具备适应和促进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能动力量。”^③ 第四类认为，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赶超先进的过程，其目标是要达到或超过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指后进国家通过改革传统教育，推动教育发展，使之赶上先进国家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④

关于教育现代化的讨论。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教育“现代化理论已经过时了”^⑤，也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概念过于模糊和宽泛，使用也出现了极大的模糊和混乱现象。“教育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筐式概念”，“一只方便的篮子”，教育学中许多具有独立性的词汇，譬如教育民主化、教育全民化、教育终身化、教育国际化、教育科学化、教育法制化、教育个性化和教育多样化，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时髦教育思想，诸如素质教育思想、主体性教育思想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思想等等，都统统装入“教育现代化”这只篮子中。在社会科学中，概念的模糊现象并不鲜见。因为社会是文化的，教育现代化也是文化的，要求文化现象的概念化像自然现象的概念化一样严密、精确，无异于用鱼在陆地上的存活时间去衡量它的寿命。特别是像教育现代化这样用以描绘近三百年来教育所发生巨大转变情况的概念，其有用性的标准显然应有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容忍这一概念的模糊性，恰恰相反，努力提高其解释能力使之更接近精确，正是我们的研究方

^① 王铁军：《教育现代化的科学界定及其发展取向》，《江苏教育研究》1995年第4期；顾明远：《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问题》，《中国教育学刊》1997年第3期；周鸿：《教育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教育研究》1997年第6期。

^② 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③ 田慧生：《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④ 参见邬光辉《中国教育现代化新视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3页。

^⑤ [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向之一。

就学术研究来说,目前教育现代化研究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研究较多关注于教育现代化操作层面的问题,如怎样进行教育的现代化,而缺少对深层价值问题的关照,诸如以什么样的哲学或价值观指导教育现代化,结果造成教育现代化研究“无根”、“乏理”的局面。第二,研究大多是单向度的,要么缺少对教育现代化问题的反省和超越,要么就走到另一个极端,全面否定教育现代化问题的研究。第三,研究中有一种超时空的倾向,缺少对中国时代背景的体认与核心问题的把握,缺少一种“主题意识”和“历史定位意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教育现代化研究的“空疏”和“远离实际”。^①当然,在华北教育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努力避免这种情况,使之更具有充实性和科学性。

三、华北教育的历史分期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无形的手。世界各国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行程无不表明:教育是人才的保证,人才是现代化的根本。只有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优先发展教育,形成教育—人才—现代化的良性循环,才能有效地、稳定地推进社会转型,合理地、健康地加快现代化的发展步伐。”^②这段话指出了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社会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基础,而教育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外来的东西或淘汰或保留,传统的东西或摒弃或发扬。和全国教育一样,近代华北教育走的是一条教育改革的坎坷之路,大致经历以下几个历史阶段:

其一,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教育引入与传统教育迥异的近代教育模式,开始跨出以儒学为半径的封建教育的藩篱。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变科举,兴学校,养人才,强中国”的大声疾呼以及京师大学堂和各地各类型学堂的筹建,使教育改革逐渐成为朝野共识。天津的洋务学堂走在华北,甚至走在全国的前列,先后创办了北洋水师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为华北培养一批军事、科技人才。1867年围绕京师同文馆应否增设天文算学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是教育改革的一次意义重大的讨论。最终设立派取得了胜利,意味着对西方文明中器物技艺和自然科学的首肯和接纳,迎来了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在华北的普遍开展。这一时期,书院教育进行了普遍的改革,书院改学堂成为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普遍的过程。

其二,因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失败而催生的清末新政和“北洋新政”,尤其是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首次以政府名义确定近代学校系统。1904年1月公布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

^① 邬志辉:《中国教育现代化新视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1页

^② 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